

晋安文史

11

教育专辑



主 编:郑师钤

副 主 编:梁敬霖 姚 镇

编 委:陈美珍 陈国平 王祖惠

林 东 林国清

责任编辑:林 东 陈庸焕

封面设计:林之本

目 录

- 郊区教育总支成立前后 周谨驹(1)
落实知识分子工作回顾 周谨驹(4)
- 多种形式办学 推进山区普及初等教育 周谨驹(7)
北峰区教育杂忆 王证明(9)
60年代初北峰多种形式办学亲历 魏维康(15)
初办北峰中学的回忆 林国清(19)
北峰教育拾零 林东(25)
调整布局,集中办学 陈炎光(35)
北峰最早的公立小学——捷板小学 林仕森 林东(42)
叶洋村教会办学小史 陈亨宁(45)
叶洋村教育世家 陈亨宁(47)
- 从两张小学毕业生集体照说起 庄可庭(48)
象峰中心小学的创办与发展 林金森(54)
解放前从教杂忆 冯有我(58)
回忆两则 陈伦(存郁)(61)
- “大跃进”前后郊区学校勤工俭学见闻 周学文(63)
全国第一个少年农场
——鼓山第二中心小学少年农场 郑秉文(66)
从远洋小学土游泳池说起 周学文(67)
勤工俭学与文艺宣传队 李义心(70)
郊区学校工业经理部创办初期 蔡贤廉(74)

秀山中学语文教改回顾	陈兰修(77)
“注提”教改之花从这里开放	陈绍铭(80)
“小学数学教材法同步改革实验”回顾	陈清华(83)
“语文整体性阅读”教改实验回顾	朱敏文(89)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职工文化补课	吴孔熙(94)
拨乱反正之初郊区的师资培训工作	郭可尧(96)
郊区第二轮小学校长培训	郭荣清(100)
郊区业余中学	吴孔熙(105)
秀山中学的选址及初创	陈宗辉(109)
区直机关幼儿园的创办与发展	马世丽(112)
浦下新村幼儿园简介	(114)
晋安区实验幼儿园简介	(118)
晋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简介	(120)
晋安区第二中心小学简介	(122)
福州市第三十二中学简介	(126)
“闽”与晋安小考	何 浓(129)
晋安郡·晋安河·晋安桥	林炳钊(130)
爱国舰长何乃诚	何 浓(132)
编后记	(138)

郊区教育总支成立前后

周谨驹

1962年初,郊区体制再次变动,恢复郊办处,当时文教科管辖的学校有鼓山、新店、洪山、盖山、马江、建新、北峰、亭江、琅岐9个学区(中学归市教育局领导),小学教师中党员非常少,仅有40来个,占教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大部分完小没有一个党员,学区也没有成立党支部。党员教师的组织关系在公社机关或村党支部,党的组织活动很不正常。过组织生活时,由于党员之间情况互不了解,工作岗位又不同,交谈思想、工作情况,展开帮助有困难,而且当时农村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方面,受“左”的路线影响,认为教师是知识分子,情况较为复杂,没有农村干部和农民那么单纯,成份好,因此,在教师中发展党员顾虑重重。思想进步教师,感到入党比登天还难。

为了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得到贯彻落实,大约在1962年5月间,郊委同意教育系统成立教育总支,并成立学区党支部,由区委宣传部部长陈振燕任总支书记,教育科科长周谨驹任总支副书记,推选近郊鼓山、盖山、新店3个学区支部书记为教育总支委员,并配有专职干部负责总支具体工作。总支办公地点设在宣传部,教育总支下属个学区支部。鼓山、新店、洪山、盖山、马江5个学区党支部直属教育总支领导,建新、北峰、亭江、琅岐4个远郊学区党支部,由于地区范围广,直接管理不便,确定以当地公社党委领导为主,建立双重领导

关系，在确定发展党员的对象和对犯错误党员的处理方面，征求教育总支意见后上报备案，上下共同把关。

教育系统党组织健全后，党员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展党员工作得到加强，“三会一课”制度得到落实。教育总支每月召开一次总支委员会，会议内容主要为研究党员教育，发展党员以及贯彻党的中心任务。学区党支部每周一晚上定为党的组织生活会（那时由于交通不方便，多数教师住校），教育总支利用暑期举办党训班，时间约三、五天，除全体党员教师参加外，还吸收部分党外教师积极分子参加，采取上党课形式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章教育，努力提高党员政治素质。当时，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学校各个方面都能起先锋模范作用。有一次，教育总支号召支援北峰区教育，党员教师身先士卒，百分之百报了名，党员在广大教师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教育总支重视发展党员工作，在教师中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在个人表现、不唯成份论，让他们知道人人都可以积极创造条件加入党的组织，改变教师对党“敬而远之”的心态，敢于靠拢党组织。同时总支要求各学区党支部对教学骨干要重点培养。有个完小校长思想进步，业务水平高，工作积极肯干，学校办得好，当地群众很满意，就是因为有一般的社会关系问题，迟迟不敢申请入党。以后通过政策宣传，个别谈心，组织他参加积极分子学习班，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教育总支成立仅一年多，就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由于 1964 年到 1966 年的“社教”、“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严重干扰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教师党员的发展也受到

一定的影响。1966年7月间，教育总支被撤消，各学区小教党支部部分属各所在公社党委领导，一直到“文革”结束，1979年3月，郊区教育总支才得以恢复，当时的蔬菜管理区也成立了教育总支。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回顾

周谨驹

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教育系统更是重灾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最重。当时，郊区教育系统有教职员 3 千多人，其中教师近 3 千人。

刚开始这项工作时，我们感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通过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我们认识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定要全面、彻底，不留尾巴。我们从两个方面抓了这项工作。

一个方面是抓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局领导亲自抓，并配备了专职人员，积极配合各有关部门深入调查了解，做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工作，本着实事求是，对本人负责的态度，查实了自 1958 年“反右派”至“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案件，对“文化大革命”以前 65 件的“右派”、“政治不纯”及其他属于政治方面的历史遗留案件，全部予以平反纠正，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也全部给予平反。另有 21 件属于经济及道德品质方面的案件，经过调查取证，平反纠正了 13 件，另 8 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维护原结论。

在平反纠正以后，我们积极做好善后工作。对“文革”中被扣工资的如数补发；对经济有困难的人员给 以适当补助；对因错案被开除公职的按政策规定作了妥善安排，能胜任工作的恢复工作，年体弱的作为退休处理；“文革”中个人财产被抄的，经查实予以退还或折价赔偿。

同时,为了不留“尾巴”,我们还认真搞好“清档”工作,把教师个人档案中被非法塞进或被迫交待的不实材料,包括“右派”,四清”等运动的材料全部清理,剔除销毁。

另一方面,我们面向全体教师,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首先是政治上充分信任,在教师队伍中积极发展党员,让优秀教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政治上的进取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郊区教育系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学校中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政治优势不断增强。过去一部分教师由于所谓历史、成份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大胆使用,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排除“左”的影响,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一批有敬业奉献精神,有积极领导才干的教师进入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大胆放手让他们工作。学校各项工作出现生机勃勃新局面。

其次是业务文化素质上的提高。区进修校因人而异,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师资培训班,让一部分学历未达标的教师,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深造的机会,鼓励一部分教师参加各级党校、电大、业大学习,得提高。

三是生活上关心,为教师排忧解难。教师队伍中反映最强烈的是住房问题、夫妻分居问题和农转非问题。几年来,区政府从财政拨款、乡镇支持、个人集资等多条渠道,为 500 多户教师解决了住房问题;对于夫妻分居问题,教育部门积极向教师的对方所在单位进行协商,征得对方单位同意后,再与有关部门联系,经过多方努力,为部分教师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让他们安心做好工作;对于教师农转非的问题,按规定政策主动抓紧时间给以办理。

政策暖人心,通过大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郊区教师队伍稳定下来,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为振兴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多种形式办学 推进山区普及初等教育

周谨驹

北峰山区山高路陡、交通不便，村落分散，有的自然村只有几户人家。在 60 年代初期，受“左”的路线影响，生产落后，经济贫困群众温饱得不到解决。这些都给山区普及初等教育带来很大困难。1962 年，北峰区从闽侯县划归福州市郊办处管辖的时候，学龄儿童入学率仅达 50% 左右，旧文盲不扫除，新文盲与日俱增。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普及小学教育的指示，市、区教育部门抽人联合组织山区普及教育调查，重点深入北峰日溪等乡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山区学龄儿童入学率低的原因有三：散，北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穷，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差，办学条件差。根据这种状况我们采取了几个相应措施。

一是办学形式不搞一刀切，教学要求有区别，上课形式和时间要适应该地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尽量使孩子们做到学习、劳动两不误，对个别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尤其是家务负担重的女学生，给予更多的方便。如根据农事季节而异：农闲时多读，农忙时少读；根据居位条件不同而异：人口集中的每天上课，村落分散的，生数少的隔日上课或巡回教学，个别还要送教上门；根据地理、设备条件不同而异：道路较平坦，有电灯的上晚班，山路崎岖或照明不好解决的则上早、午班，有教堂的集中到学校上课，教室不够的利用队址，租厝上课。参照上述几条原则，当时举办了一揽子学校（多级班）、耕读小学（半日制、隔日制、早班、午班、夜小学）等，办学形式五花八门。但

不管什么形式，都得保证每周学习 10~12 节课，并统一使用省简易小学课本。教学由所在地全日制小学教师统筹安排，或招聘民办教师；学生不交学费，只交课本、作业簿等代办费，有困难的由区教育部门补助。

二是学校规章制度有灵活适应性，允许山区孩子带弟妹上学，允许他们利用课间休息回家烧火煮饭，允许他们只上语数两科，迟来早归等等，尽量做到学习、家务两不误。受到群众欢迎。

三是成立教学辅导站，聘请政治素质较高工作表现好，业务能力较强公办教师担任辅导员，深入各办学点辅导检查，努力提高多种形式办学的教学质量，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有所得，达到应有的文化程度，

四是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建立“两册一卡”（学龄儿童花名册、在校学生花名册和学籍卡）以及出席考勤、成绩考查、教学管理等规章制度，建立定期汇报、检查、评比制度，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建立“校内包班、校外包队、责任到人”的工作责任制，并设立“无流生流动红旗”、“普及小学教育奖”等多种鼓励办法，推进山区普及初等教育。

多种形式办学有效地推进了北峰山区初等教育的普及。1963 年 4 月，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陶带队到北峰区验收办学情况，北峰区适龄儿单入学率达到 95.6%。

北峰区教育杂忆

王证明

发展概况

北峰区原属闽侯县，为石牌区，1958年改为北峰区，1962年划归福州郊办处辖，是一个偏僻的山区，跨踞大小北岭，解放前曾一度称为双北乡。“村落星散，人口稀疏，文化落后”，是北峰地区的特点。解放前只有两所比较正规的小学，一为石牌小学（曾作为双北乡西北区中心国民学校、双北乡中心国民学校）。一为捷坂小学（曾作为双北乡西北区中心国民学校），而其他所谓国民学校则多为私塾换个牌而已。临解放时，双北中心小学（今石牌小学）仅2个教师，20来个学生，其他小学根本难以为继，全区小学学生不过数十人。个别富豪都把子女送到福州读书，贫苦农民子女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

解放初期，除双北中心小学改名为石牌中心小学，有固定校址（石牌庙），算是比较正规的一所小学外，其他各自然村教育基本保持旧状。要找一位高小文化程度的贫下中农青年当会计，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少数民族地区，记“工天”用笔画或绳结，还是有的。

1953年，乡政权建立后，北峰教育事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区办起13全民所有制公立初级小学，除原有的捷坂、桂湖、上寮、汶洋4所外，还在宦溪、板桥、芹石、大坂、寿山、山秀园、前洋、叶洋、铁坑等9个自然村创办起9所公立初级小学，教师15人，学生数300—400人，同时在党洋、日溪、梓山、

汶石、井后、尤山、牛洋、岭头、后坪、高立、弥高等 11 个自然村，先后办起 11 所民办小学，民办教师 11 人，学生约 150 人。公民办小学的校舍全是利用当地词堂、教堂和庙宇。

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除增设寿山学区（与石牌学区并列）上，在原来只办初级班的石牌中心小学增设高小班，把全区所有高小学生集中起来，教师由 2 人增加到 4 人，高小学生 20 多人，规模虽小，但校长、教导主任、教师配备齐全，算是当时北峰教育的最高学府。教育部门对民办教师进行全面审查录用，教材一律由学区统购统发新课本，取替了以往私塾惯用的《启蒙三字经》、《论语》等封建教材，彻底推翻了封建教育的残余。这可算是北峰教育大改革的新起点，也可算是北峰民众文化教育新翻身的起点。

1958 年，石牌区改名为北峰人民公社，石牌、寿山两个学区合并为北峰学区，校址随人民公社迁移岭头大队（村），北峰教育事业又起一次新的跃进。北峰中心小学增设初中班（加冠，后命名为闽侯第七中学即今北峰中学），新建起 3 座（小学一座）砖、土、木结构的校舍，占地 10 来亩，教学楼、宿舍、体育场、劳动基地俱全。中学教师 16 人，学生 60 多人，学生来源除本公社内招收外，大部分是由南屿、上街，马尾等地送来的。公社还在日溪的坝坑创办一所农业中学，专职教师 2 人，学生 40 多人，有课堂，办有劳动基地，实行半耕半读。

小学教育也有相应的提高和发展，学区在宦溪、捷坂、桂湖、上寮、汶洋、峨眉（民办）等 6 所初级小学增设高小班，改为完全小学，高小学生将近 200 多人。居民在 50 户以上的井后，汶石，点洋，梓山、东坪、九峰、长基、芙蓉，牛洋、贵洋、溪下、牛项、弥高等 13 个较大的自然村都办起了公立初级小学，

增加教师 14 人，增加学生 400 多人，居民在 50 户以下的路口、党洋、中楼、尤山、落坪、上仑、南洋、赖婆里、红庙、江南竹、沙溪、丘里、黄土岗、亥窑、民义、洲洋、胜利、后坪、鹅鼻、高立、溪湾、湖中、垅头、菜岭等 24 个自然村，都创办了民办初级小学，增加教师 24 人，增加学生 70—80 人。基本实现了大村有完小，中村有初小的小学教育网。

1962 年，北峰划归福州市郊区管辖后，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原闽侯第七中学改为北峰中学，有 3 个完整的教学班（初一～初三），教师 16 人，学生 150 多人。1965 年，福州蚕桑学校移迁北峰，合并北峰中学上课，必名为福州农业职业学校，采用一个学校两面牌子（高中部为福州农业职业学校，初中部为北峰中学），教师增加到 28 人，学生达 240 多人，给北峰中学教育事业锦上添花。

1963 年，在市委、郊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小学教育事业得到又一次发展。学区根据村落星散、人口稀疏的特点，在居民 3—7 户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三仔濑、瓦坪、中楼等极偏远的自然村，办起一所巡回小学，由公立学校派专职教师（党员）担任教学，又如梅坑、垱里、西洋、芹草洋等几个僻远自然村，各办起一所“一览子”学校（即生产队会计、小学教员、夜校扫盲教师一统包），共增加教师 8 人，学生 60 来人，实现了村村有学校，人人有书读的新教育局面，打下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牢固基础。中、小学教师总数达 125 人（中学教师 28 人），学生总数 3500 多人（中学生 240 多人）。经市教育局派员验收，全区小学普及率 95.6%，市委宣传部专文通报表扬。

创业艰苦

1958年，中共闽侯县委提出：农村教育要搞“七普及”，即普及初中、小学、高小、幼教、托儿所、扫盲、文化馆。做到“村村有学校，人人有书读。”在村落星散、道路崎岖、没有公路、开门见山、出门爬岭、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山沟里，地大、人少（指学校骨干少），困难重重。要完成以上任务，要解决适龄儿童入学普及率问题，关键在教师。当时北峰区多民办教师，教师工资靠生产队发给，时常没有保证。作为学区领导，我不能不经常与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打交道。每学期下校普遍检查，起码三次（期初、期中、期末），少数民族和僻远的地区还不止，跑了3~5趟还难了事。那时山区多数地方未通公路，更谈不上乘车，只能身背雨伞，手挂拐杖，只身在崎岖的山道上跋涉。

记得1963年夏，北峰划归福州市管辖后，市委宣传部长鞠恒尧视察北峰，回去后，指派市教育局初教科陈建华科长和3位督导员前来北峰作小学普及率大检查。这位党员女科长，作风踏实苦干，自己抽选了老区铁坑村和少数民族南峰瓦坪村深入检查。这两个自然村，确实是有代表性的僻远村落，我给他们带路。当爬过长基村的“司傅岭”、点洋村的“见天岭”、日溪村的“坝坑岭”、铁坑村的鸭姆撵（滚滑的意思）岭”和南峰村的“竹篙岭”后，陈建华问我：“北峰像这样的岭路有几条？”我说：“大的20几条，小的难以计算。她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学区每年须备几双铁草鞋呢！”他们把路程用笔计算了一下：每次下校检查，往返要翻百座大山，万层石台阶，年复一年，确实不容易啊！他们每个人脸上无不露出钦佩的神色。

经过几年的努力,尤其是1962年的多种形式办学,北峰区学龄童入学率达到95.6%,终于通过了市委的检查。市委予以通报表扬。

当时教师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中心校未迁到岭头以前,校舍借用在石碑境内,学生多是远道而来的住宿生,人多庙小,师生挤得可怜,教师们便睡在办公室旁或神殿边,白天为办公室,夜为宿舍,清晨整被垫,夜晚打地铺,自动腾出比较宽敞的戏台两旁走廊楼作为学生宿舍。他们在校白天备好课,教好书,批改好作业,教育好学生,到了晚上,人人精神抖擞,还要打着手电筒到五、六里外的红庙、江南竹、山头顶、溪下等村担任夜校义务教师,风雨无阻。中心校教师如此,其他小学以至那些巡回小学等多种形式办学的教师艰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50~60年代,北峰的教师们就是以这种跑断腿,磨烂舌的精神取得了北峰山区小学教育全面普及,打下了北峰教育的基础。现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教师们依然感慨万千。

上寮建校

上寮原是城工部五县中心县委的基点村,林白武装游击队的根据地,解放前有80%以上的贫中农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游击队,好多人是游击队的主干。如王金钿同志就是城工部武装游击队的队长,解放后游击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分区独立团,王任营长,陈利锵、王宗义也分别担任过连长,张经仙、王天元都是北岭工委成员,刘春香、王焕佛都是游击中红色妇女。上寮村村民政治觉悟高,办学积极性大。村里原先的学校借用在上寮境内,场所窄小,光线阴暗,容纳